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王庆成 虞和平主编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1862—1874〕

〔美〕芮玛丽·著

房德邻 郑师渠 郑大华 刘北成 郭小凌 崔 丹·译

刘北成·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

• 芮 玛 丽

ISBN 7-5004-3258-5



9 787500 432586 >

ISBN 7-5004-3258-5 / K · 492 定价：24.00元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王庆成 虞和平主编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1862-1874)

〔美〕芮玛丽·著

房德邻 郑师渠 彭大华 刘北成 郭小凌 崔 丹·译

刘北成·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1—447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王庆成,虞和平主编)

书名原文: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n Restoration, 1862—1874

ISBN 7—5004—3258—5

I. 中… II. ①芮… ②房…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1862—1874 IV. K256.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7399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河北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增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和走向世界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于1987年创刊了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10多年来,本译丛虽然刊行种数有限,但是颇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赏、鼓励和支持,为了迎接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繁荣,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本译丛所选译著作的研究时限以1840—1949年为主,同时适当向前后延伸,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译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知所见有限,希望海内外史学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2001年8月

155

前言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是已故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一部有影响的著作。该书于1957年问世后，立即受到西方汉学家的注意，对它进行了评论；前苏联的历史学家也作出反应，发表了批评文章。在美国大学里，它被指定为主修中国历史的大学生、研究生必读参考书。可以说，《同治中兴》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由于这部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所产生的影响，也由于在它出版后的几年里又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的新研究成果，因此，芮玛丽对全书作了一次修订补充，于1962年仍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第2版发行。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中文译本，即根据此版翻译。

“同治中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打击和英法联军的入侵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是，在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努力下，也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它又重新站稳脚跟，并出现所谓“中兴”景象，使其统治又维持了半个世纪。在《同治中兴》问世以前，西方学者对于“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没有什么专门研究，芮玛丽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同治中兴》中，作者详细叙述了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大员为“中兴”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各个方面；阐释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

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最终失败的历史根由。总之,读者从这部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国外关于“同治中兴”这段历史研究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芮玛丽写这部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读者认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她在谈到她的研究目的时说,她不赞成“砖瓦式”和“魔术式”的研究方法,认为“砖瓦式”研究方法“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细微侧面大出特出”,而“魔术式”研究方法“则是对中国长期稳定不变的原因做出洋洋大观的一揽子解释”,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为了避免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片面性,她选择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做个案研究,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解释”。因此,她把“同治中兴”放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注意分析那些对后来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展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

在阐释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时,芮玛丽没有跳出西方流行的“冲击——回应”的理论模式。但是,她没有把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冲击如何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方面,而是放在中国社会内部如何做出回应方面。她指出:一个社会,“当新的因素引入时,任何文化都会分解和重新整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每一种文化都是吸收那些似乎相近的外来因素,并继续沿着其自身长期确定的利益所规定的路线发展”。这表明她除去注意“外因”的作用外,还力图从“内因”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其许多分析和议论不同于那些一味强调西方冲击影响的学者,而具有独到的见解。

芮玛丽在从“内因”来解释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时,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她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叙述和分析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和决定着“同治中兴”的中坚人物奕訢、曾国藩、

李鸿章等和社会精英——士绅们的生活、思想和行动,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失败。其中的某些分析和议论,至今读来还对人有所启发。

但是,芮玛丽过分夸大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影响。她甚至说:“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除去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统治辩护不说,它至少是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

芮玛丽把“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概括为“中国保守派的最后反抗”,其实就是说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的反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就是那些深受儒家文化教育和影响的保守派们“第一次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近现代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作的努力”。这样来概括和解释“同治中兴”的历史,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毕竟是不全面的。在芮玛丽看来,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是命定地不可能步入近现代社会的。因此,她对于儒家文化同现代社会相冲突的一面揭露得颇为充分,但对于它能够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的那些有活力的积极因素则完全忽视了。她也没有阐发在“同治中兴”时期出现的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起重大影响的新因素,没有给予新的生产方式和新阶级的出现以应有的注意,等等。

《同治中兴》还有这样那样一些错误和缺点,例如对于曾国藩等人过分赞扬,对于太平天国则肆意贬斥,特别是在最后一章《中兴的遗产》中,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论述更充满偏见。所有这些,相信读者自会辨识。

芮玛丽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出生于1917年,1970年去世。她于1938年毕业于瓦萨学院,1951年获

拉德克利夫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即在大学历史系任教。1959年至去世,先后任耶鲁大学历史副教授和教授兼大学图书馆远东文献部顾问。其间,曾任1965年成立的清代研究会议的领导人。芮玛丽于《同治中兴》之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和历史职业》、《中国再次估价它的过去: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著作》、《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等。

参加本书翻译的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刘北成、郭小凌、崔丹等同志,是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其中房德邻同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郑大华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其他几位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龚书铎

2001年8月

再版序言

在本书完成后几年之中,大约有十来项有关清代历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我从这些研究以及关于拙著的评论中获益匪浅。某些重要问题一直是专家研讨会上热烈讨论并通信交流的主要议题。因此,当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要我修订本书并为再版作序言时,我原以为,我或多或少能利用序言提醒读者对于我已发现的初版中的肤浅或错误之处加以注意。然而,当我再次重温这部著作时,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它的主要思想似乎依然站得住脚。

我努力纠正了初版中的印刷错误和一些史实错误。例如:举行殿试的场所和文祥亡故的日期。在确定这些问题的准确性方面,我得到何炳棣教授、刘广京教授和孙任以都博士(Dr. E-tu Zen Sun)十分慷慨的帮助,他们每一个人都小心细致地反复核对这部著作,而按照常规,学者只有对待自己的作品才会持如此审慎的态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贝尔先生一直异常热心,既注意这一修订版的要旨,又不忽视其细节。

何先生、刘先生、孙女士和格雷戈里先生提醒我,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应该在我论述得比较简略而最近有详细研究成果问世的问题处加上脚注。再版增加脚注被插入初版脚注中间,并用*标明(中译本的注释处理,见译后记。——译注)。文献目录没做任何增补。我不打算用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出版的多卷本的中文档

案集来填充新注释。这些原始资料中最重要的是《海防档》(九卷, 1958年台北出版), 以及《洋务运动》(八卷, 1961年上海出版)。诚然, 这些资料选辑十分重要, 但是, 在我所能够查阅的范围内, 这些资料没有使赞同或反对这部书总论题的观点在份量上有所变化, 因为这些资料选辑包含了同样类型的文件, 有时是同一种文件, 而那些文件我已从《实录》、《东华录》、《筹办夷务始末》以及当时重要中国人物的官方和个人书信文件集中征引过。

自本书于1957年初版以来, 有关的评论、研讨和通信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总体看来, 这些问题我似乎已在初版中给与回答, 但是也许还不够清楚。因此, 在此对这些关键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可能是有所裨益的。

太平天国起义。一些评论者指出, 在我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简短论述中, “对朝廷一方有明显的感情投入”。我认为在一部以清帝国努力重建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为主题的著作中, 感情的投入不仅不可避免, 而且十分必要。我因此被指责“对中国人民持有敌意”。然而, 不管我们今天怎样评价太平天国起义, 大量的证据表明, 在中兴时代, 中国人民是以惊恐和憎恨的心情来看待太平天国起义的。

对外关系。关于西方列强的合作政策是一个帝国主义阴谋的见解, 迄今没有任何证据。在这方面, 新的研究成果没有改变原有的基本内容, 仅有一点细微的变化。英国政府采纳并支持了由普鲁斯和阿礼国凭经验形成的一项政策; 英国政府没有系统地阐述它。凡是熟知英国外交史的人都不会持相反看法, 但是驻华公使的作用比七年以前我所了解的甚至更富有开拓性和重要性。在添加的注释中, 我已表明赞同英国年轻学者们最近关于这一点的研究成果。

经济。由于采用新方法对已知的史料加以利用, 以及最近大

陆出版了原始资料,最新的研究已毫无疑问地证明:整个清代商业活动的水平比以往估计的要高。然而,本书的论点——清政府坚持不懈地用道德原则限制商业,并卓有成效——得到了肯定。

中兴领导人物的品格。我对中兴领导人物高尚品质的赞美受到批评。争论的焦点是曾国藩。他已被中国大陆定论为“卖国贼和刽子手”,台湾则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已献出一个曾氏私敌的日记。这部日记比曾氏任职时的文献记录更重要。日记表明他受到上级和部下的一致尊重,并受到了解他的外国人无可置疑的真诚赞誉。无疑,他在惩罚起义领导人物时过分严厉,这在拙著中已作了阐述。然而,我仍找不出理由改变我对这位人物的赞誉。

至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的断言,说我对中兴领导人物的尊重转移为对国民党的尊重,完全是一种荒唐的推理。

科举制度和社会流动。我们现在了解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努力,然而,通过科举向上升迁这一公认的途径,仍没能扩大到足以应付清初及清代中叶的人口爆炸。这一事实并非直接适用于同治时期,该阶段经历了人口的灾难性损失,并且特别广泛地增加了各级科举的地方名额。然而,官职的数量不是根据科举按比例地扩大;此外,日益明显的迹象是,新式军队中大量重要成员(虽然不是他们的领导)未经过科举的训练。因此,19世纪末叶在野的不安定的文人士子日渐增加和军队人员不断增多,而中兴的领导人一旦去世,地方上的文官权就会移交给后者。

究竟有没有一次中兴?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始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基本体制的变化是不可阻止的。显而易见的是,中兴失败后,军事和财政大权从正在瓦解的中央转移到地方。中华帝国在1870年后的痛苦历史非但没有证明“所谓的同治中兴从未

出现”，反而映衬出中兴十年间的巨大成功。同治时期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

芮玛丽

1962年8月写于耶鲁大学

question in her external relations, but internally the government in the 1850's and 60's was embroiled in one of the great rebellions in Chinese history — the Taiping Rebellion which was to threaten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Ch'ing. It was suppressed in 1864, also ha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with the Western world and was a graphic illustration of the dangers of the state of the times.

In the midst of this seemingly hopeless situation of external aggression and internal rebellion — a few Chinese leaders turned to an unofficial and informal system, which existed as an adjunct to the rigi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as a means of providing the men and money they hoped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and repulse the foreigners. This system was known as the *mu-fu* system and involved the use of private advisers, who were recruited on a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basis by the provincial officials, and who supplied them with the knowledge they needed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of governing.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of the Ch'ing, as under the earlier dynasties, was based on a system of examinations which selected officials on the basis of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system was designed to produce a class of officials who were qualified to serve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 system was not designed to produce officials who were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officials who were selected by the system were often highly educated, but they were not trained in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government. They were often lacking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ir office and, normally, had little inclination to acquire it. The *mu-fu* system was a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It was a system of private advisers who were recruited on a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basis by the provincial officials, and who supplied them with the knowledge they needed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of governing. The system was known as the *mu-fu* system and involved the use of private advisers, who were recruited on a 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basis by the provincial officials, and who supplied them with the knowledge they needed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situation of governing.

本书是已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一部有影响的专著，详尽叙述了晚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为“同治中兴”（1862-1874），挽救腐败清王朝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各个方面，并且阐释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最终失败的原因。其观点虽争议很大，但颇有独到之处。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已出版书目

《大门口的陌生人》 [美] 魏斐德著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美] 孔飞力著

《中国早期工业化》 [美] 费维恺著

《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 [美] 陈锦江著

《英国对华政策》 [英] 杨国伦著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美] 施坚雅著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日] 滨下武志著

《朋友·客人·同事》 [美] K.E.福尔索姆

《同治中兴》 [美] 芮玛丽

责任编辑 张小頔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目 录

前言	(1)
再版序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新纪元	(13)
第三章 合作政策	(25)
第四章 中兴的思想	(54)
第五章 文官政府的恢复	(86)
第六章 镇压叛乱	(121)
第七章 地方行政的重建	(154)
第八章 中国经济的恢复	(182)
第九章 自强运动	(240)
第十章 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化	(274)
第十一章 功败垂成	(312)
第十二章 中兴的遗产	(377)
译后记	(396)

第一章

绪 论

没人怀疑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异常稳定和保守的国家,但是关于“中国保守主义”的各种不加界定的说法却集中出现在多数有关中国近现代问题的讨论中。譬如,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某种改革终未实现;外国列强为了维护现存秩序而支持“保守势力”,从而阻碍了进步并加剧了混乱;与表面迹象相反,中国依然存在着“潜在的保守主义”,如遇适当的鼓励,它能再度抬头;等等。

虽然“中国保守主义”不仅对研究近代中国,而且对比较政治研究都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是这个标签很容易被误解。如果“保守”是指“妥善地保存,防止伤害、腐烂或损失”,那么 19 和 20 世纪中华帝国的官吏和士人为维护儒家秩序所采取的一系列立场肯定是保守主义的,但是,其意义有别于西方近代的保守主义。

我们的政治术语“保守派”是在法国革命后由伯克的赞赏者们创造的。这些人力图保存启蒙运动前欧洲社会的基督教的、反理性主义的、贵族的和封建的世系。而中国的保守主义是在几十年后,在太平天国起义后独立形成的,其目的在于保存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儒教的、理性主义的、士绅的和非封建的世系。与中国的激进派不同,中国的保守派对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